

中国古代“舆地总图”鉴赏

孙果清

舆，原意为车的底座，承载百物，引申为“尽载百物”。大地亦载万物，故地谓之舆。古文中也有天为盖，地为舆之说。因此，古人称地理学为舆地学，地图谓之舆图或舆地图。

《周礼·地官·土训》云：“掌道地图，以诏地事。”《管子》有《地图篇》。“舆地图”一词，最早出现于《史记·三王世家》，其云：“御史奏舆地图”，“臣昧死奏舆地图。”《史记·索隐》司马贞引虞喜《志林》载：“舆地图：汉家所画，非出远古也。”可见，先秦时已有“地图”一词，汉代将地图称作“舆地图”。地图的绘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自远古到秦汉，从原始图画至原始地图逐渐发展到舆地图，无论在地图的种类、地图的内容及绘画技术，均已具有较高的水平。然而，地图不易保存，加之历代战乱及自然损毁，传世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了。

舆地图有全国地图，省、府、州、县地图。据目前所知，全国性地图——即“舆地总图”，以汉代用缣八千匹画成的《天下大图》为最早。西晋初年，裴秀在其门客京相璠的协助下编绘的《地形方丈图》是在《天下大图》的基础上，以一寸折地百里的比例尺（约 1:180 万）缩绘成一丈见方的晋代全国地图。此图曾流传到唐代，以后便失传了。唐代贞元十七年（801）杰出地图学家贾耽（730—805）沿袭裴秀的制图方法，令绘工画成《海内华夷图》一轴。图广三丈，纵三丈三尺，画面约十方丈。比例尺是一寸折地百里，几乎比裴秀《地形方丈图》的面积大十倍。可惜《海内华夷图》没能保留下来，我们只能从其他图书的记载上推知此图的大致情况。

宋代是制图技术较为发达的时期，除上述全国舆地图以外，于公元 993 年（淳化四年）曾用过绢一百匹，绘成有名的《淳化天下图》。这样大的地图，可以说十分罕见。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沈括（1031—1095）自熙宁九年（1076）奉命编制《天下州县图》（又称《守令图》），历经十二年的时间，编绘大图一幅，高一丈二尺，宽一丈，是当时最好的全国地图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在四川荣县发现北宋宣和三年（1121）刻石的《九域守令图碑》。碑高 156 厘米，宽 107 厘米，地图纵 129 厘米，横 101 厘米。现存四川省博物馆。碑正面为《九域守令图》，背面刻有“莲宇”两字。地图上北下南，北部绘到北岳恒山。东边绘出大海。南至海南岛，西达四川省西部。地图内容大部分完好可辨，绘出了山脉、湖泊、江河、州县等内容。海岸线表示较详。黄河、长江的走向大体正确，河流主支流分明。地图上标注了 1400 多个宋代地名，几乎包括了北宋末年中央政权所管辖的全部州县。地图上未画方，用形象法表示各大湖泊以及五岳。海南岛位置和形状较为正确。比例尺大约在 1:180 万左右，为一寸折百里的地图。

南宋初年（1137）刻在石板正背两面的《华夷图》和《禹迹图》，完好地保存了下来。从图上文字注记“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，今取其著闻者载之”推知，这两幅地图显然是根据贾耽的《海内华夷图》转绘而成。（此为王庸先生观点。曹婉如先生认为《华夷图》可能是以唐代贾耽《海内外华夷图》为底图编制的。）不过《海内华夷图》是一幅大图，“华夷图”和“禹迹图”却分成了两幅。该石板长宽皆为 114 厘米。《华夷图》没有画方，四周标注了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。图的范围东到大海，绘出了朝鲜半岛；北到长城以北，

东北部表示了黑龙江流域；西到帕米尔地区；南达海南岛。图中较详细地表示了山脉、县、州、府以及各大河流与湖泊。但轮廓位置不够准确。地图四周有文字注记，注出四方番夷的历史沿革。《禹迹图》采用画方绘图法绘制而成，每方折地百里，横 70 方，竖 73 方，共有 5110 方。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地图。海岸线和河流形状，较《华夷图》更为接近实际。

现在苏州市碑刻博物馆还保存另一石刻全图性舆地图。为南宋淳熙七年（1247）黄裳所作的《地理图》。图碑高 203 厘米，宽 106 厘米。没有画方，与《华夷图》绘法相仿。该图范围：北到黑龙江，西达玉门关，南到海南岛，东抵大海。图上详细地反映了南宋时期的行政建制。路、府、州名称显而易见，路名刻成阳字，所有府、州名刻成阴字，均加方框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不加框。山名括以方框，而水名则用椭圆形符号括之。图上注出府、州名称 368 个，军监 63 个，河流 78 条、湖泊 27 个，山岭 180 个，关隘 24 处。东北的森林用形象符号表示。河流的走向，海岸线的轮廓及山东半岛的形状均绘得比较正确。该图比例尺大约 1：250 万。图下刻有王致远的跋文。

南宋末年，还有一幅反映中国版图的《舆地图》。原本已佚。而其拓本现藏日本京都栗棘庵。此图约 2 米见方，其绘法及风格与苏州石刻《地理图》有相同之处。未记作者和年代，仅中上方列“舆地图”三字，左上方刻“诸路州府解额”（即科举人数），从图上府州县名推知，为南宋咸淳（1265—1274）朝所绘。地图内容以宋代政区为主体，周边绘出了蒙古高原、契丹、女真、西夏、印度尼西亚诸岛屿等国家名称。中国大陆州县之间陆路交通记述尤为详尽。山脉、河流、湖泊、海洋、林木均用形象符号表示。

除上述石刻舆地总图以外，还有木刻的全国总图，如：南宋景定年间（1260—1264）志磐编撰的《佛祖统记》中，保留着一幅前人编绘的“东震旦地理图”。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为“Cinisthana”，在佛教经籍中译作“震旦”。因此，“东震旦地理图”，实为东方的中国地理图。绘制范围：东起朝鲜、日本、西到青海、新疆一带，南达南海，北抵长城一线。周边标注出女真、契丹、真腊、交趾、三佛齐等国家名称。全国行政区划以“路”划分，非常清晰。图中较详细绘出当时全国所设的二十八路及府、州、郡、监各级地名。“路”的名称以阴文表示。路和府的治所一般加椭圆形或圆形框。诸路之间有曲线为界。河流用双曲线表示，海水绘有浪花，五岳山脉及长城用形象符号绘出。尽管此图图幅不大，但它是书籍中版刻地图的代表，对以后制图有着一定的影响。

元代尽管历史不长，但仍出现了几位著名的地理、地图学家，并编绘过很有影响的舆地总图。其中有李泽民的《声教广被图》和清浚的《混一疆理图》。关于李泽民和清浚的事迹及其地图情况，中国文献记载很少。从朝鲜人权近的一篇跋文中得知：“吴门李泽民《声教广被图》颇为详备，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清浚《混一疆理图》备载焉。”并得知前者之图无画方，后者图上有画方。建文元年（1399）明惠帝登基时，朝鲜贺使者金士衡，将上述两幅图带回朝鲜。经李芸详校合为一图，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，合成为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》。现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存有该图的摹绘本。

元代另一位杰出的地图学家朱思本（1273—1333），曾游历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江西、湖北等十省，以实际考察和文献记载为依据，积十年之功，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《舆地图》，图成勒石，长广七尺。图碑现已失传。幸而我们能从明代罗洪先的《广舆图》中了解该图的大致情况。

明代的舆地总图主要有两种类型：其一为单幅舆图，其二为书本式的单幅或者由多幅拼合而成。后者以罗洪先的《广舆图》为代表。据《广舆图》序载，它是据朱思本舆地图简缩而成。同时增绘边图、河图、漕图、海图等专题地图，成为一部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地图集。初刻于 1555 年前后，开本为正方形，纵 34.5 厘

米，横 35.5 厘米。卷首“輿地总图”共划分 342 方，每方五百里。图形轮廓、水系和城邑位置都比较正确。全国府州县地名均有标注。此图中的自然地理要素和表示方法源于朱思本《輿地图》，所以观此图可知朱图本来面目。

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，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，在中国古地图中，其科学性是最强的。从明嘉靖后期直到清初，有许多地图如明万历年间汪作舟刊行的《广輿考》，天启年间程道生的《輿地图考》，崇祯年间陈组绶的《皇明职方地图》，吴学俨、朱绍本的《地图综要》，潘光祖的《輿图备考》，顾祖禹的《輿地总图》，薛凤祚的《车书图考》等等，均是参照《广輿图》绘制而成的。

明代绘制的单幅輿地总图，代表之作有《大明混一图》，杨子器题跋的《輿地图》等。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《大明混一图》，是一幅反映明王朝全国区域及邻近地区在内的世界地图。大约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（1398），绢底彩绘，无画方格，绘图范围：东起日本，西到西欧，南括爪哇，北达蒙古，方位上北下南。图中没有明显的疆域界线，而着重绘出了明朝十三布政使司所属府州县名称及其他地理位置，并用粉红长方格书写地名以及山脉、河流、湖泊泽地、镇寨堡驿、渠塘堰井、边地岛屿，古河道、古遗址等分布情况，多达数千余处，在绘画手法上尽管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地形地物形象化画法，但在设色方面具有独到之处。如：蓝色方地红字书“中都”（今安徽凤阳），指出“皇都”（今江苏南京）是明王朝政治中心所在。山脉峰岭各有其名。五岳（泰山、恒山、华山、衡山、嵩山），五镇（霍山、沂山、吴山、无闷山、会稽山）精美醒目，在粉红长方形内注方位及名称。长白山、昆仑山、大小雪山涂以白色，意为终年积雪不化。全国水道纵横。黄河以粗黄曲线表示发源于星宿海，入山东境内分三支，故道由利津入海，新道则经江苏淮安入海。长江发源四川以西，东流于江苏通州入海，所经鄱阳、洞庭各湖泊位置准确。其他河流以灰绿曲线表示，注名者百余条。明疆域以外地区，以西部描绘较详，标绘名称的地名几百处，河道、湖泊一目了然。另外，图内有注记十余处，记述特殊地区自然、民情、风俗及里程等。全国汉字地名按等级贴以满文标签，说明此图于清初时为清政府或官员所用。

杨子器题跋的《輿地图》，也是单幅輿地总图的珍品。现存大连市旅顺博物馆。原图绘于明正德年间，后于嘉靖五年（1526）重绘。图高 164 厘米，宽 180 厘米，绢地彩绘，方位上北下南，画法与《大明混一图》相似。该图无图名，图下方有杨子器的题跋，范围东到大海，南至海南岛，北达长城以北的苏温、兀秀一带。此图内容详细，府、州、县、卫、所等地名 1600 多个，山脉 500 余座，绘工十分精细。全图以不同的符号表示不同等级的居民地，用六种颜色分别表示各种要素。如省界用红色，黄河为黄色，山丘、岛屿底部为棕色，顶部为绿色，名胜古迹多以象形表示。长城像一条巨龙蜿蜒于山岭之间，十分壮观。虽然图上没有“画方”，但海岸轮廓、江河位置和形状以及府、州、县的位置均较准确。杨子器跋《輿地图》和“大明混一图”是中国古代地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图精品。后世一些地图的绘制，均受其影响。如：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 年）刊印的王泮题识的《輿地图》与杨图就很相似，是略晚于杨图的全国地图。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存有明万历三十一年至天启六年间（1603—1626）摹绘增补本。此外，明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刊行的《皇明一统地理之图》，明崇祯四年（1631）刊行的《皇明輿地之图》等也属于这一类。

清初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经纬度测量和编制全国地图的工作。在康熙皇帝主持下，利用西方先进的测绘仪器，以传教士为主，中方人员协助，从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六年（1708—1717），先后在内地各省、台湾、东北、蒙古、西藏等处测量经纬度，在此基础上编成著名的康熙《皇輿全览图》。雍正年间，在康熙朝测绘成果的基础上，参考外国绘制的地图资料，增绘了西部和北部，扩大了制图范围，编绘成内容详细的雍

正《皇舆全图》。乾隆年间，先后两次派人到哈密以西广大地区进行测绘，后在康熙《皇舆全览图》的基础上，修订补充，编绘了《乾隆内府舆图》又称《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》。

清康、雍、乾三朝由实地测绘编制的全国地图，版本较多，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
木版印刷本，最早刻于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，有总图1幅，分省图和地区图28幅，但缺少西藏和蒙古西部地区图。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第二版刊印时，总图增补西藏和蒙古西部地区，分省图和地区图增加到32幅。总图东到库页岛，西至阿克苏以西的叶勒肯城，北到贝加尔湖，南到海南岛。图上绘有经纬网，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起始子午线，纬线呈等距平行线，经线斜交于北极。这个版本现已少见。

铜板印刷本，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制版印刷。图上以每纬差5度为一排，共八排，每排又分若干幅图，全国共计41幅。绘图范围同康熙六十年木版图大致相同。而关内各省地名注汉字，关外皆注满文，1921年在沈阳故宫发现该图铜板，再次编印时由金梁题名为《满汉合璧内府一统舆地秘图》，流传较广。

康熙末年，出现了以省、府分幅的地图，即由《皇舆全览图》派生而来的《康熙分省舆图》，共227幅图，注记均为汉字。该图只有国内各省，未绘邻国地区。《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》中的216幅图，即属该版本。后印过单行本，图名不一，如《内府舆地图》、《大清舆地图》、《清一统舆图》、《康熙分省分府图》等。

雍正年间编绘的《十排皇舆全图》，是较少见的一种内府舆图。已发现有雍正三年、五年、七年、八年出版的四种版本。这几种版本，在制图范围、地名注记、采用的制图网络及绘画风格等方面均相仿，东到大海，西至黑海与地中海，北到北冰洋，南抵海南岛。图上正方形网格，仅起控制定位作用，非地理坐标。图上由北而南每8条横线为一排，共十排，故称雍正《十排皇舆全图》。图上西北、东北、西南等地的地名，用满文注记，长城内注汉文。该图吸取了康熙《皇舆全览图》之优点，补充新资料，起承上启下作用。

乾隆时代绘制的全国地图，有三种版本传世。一是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铜板墨印《内府舆图》，又称《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》，有图103幅，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起始经线，但未有零度经线，而注“东一”，“西一”，其他经线皆斜向北极。以纬线每5度为一排，共分十三排故名。二是《内府一统舆图》，铜板墨印，绘法与《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》基本相同。但以北纬线每8度为一排，共八排，其始经线已改作零度，东到东经39度，西至西经97度。北到北冰洋，南抵海南岛。三是《乾隆十排皇舆全图》，墨印，满汉文标注地名，内容与注记和“乾隆十三排图”基本一致，自然地理要素有所增加。图上未有经纬网，而与雍正《十排皇舆全图》相同，绘有正方形网格。

道光初年，董方立以康熙、乾隆两朝地图为基础，编绘《皇清地理图》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李兆洛又在此图基础上，编绘《皇朝一统舆地全图》。这是经纬与计里画方并存于同一地图中的代表作。其后出版的一些地图如：胡林翼、严树森补订的《大清一统舆图》，同治三年（1864）编制的《皇朝之省府厅州县全图》等，均是采用经纬和方格网并存的舆地总图。